

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

冯黎明

阅读文学文本是文学理论活动的起点,而对文学意义的阐释、反思、定义则是文学理论活动的终点。现代性的知识学诉求使文学理论在知识学属性上追求客观性、形式化和学科性。然而,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对象是阅读经验,阅读经验的生成、内涵和存在方式具有主观性、语境化和超学科性的特质。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表现为:反思性、语境化和前学科性。

一、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一种现代性方案

《中国大百科全书》关于“文学理论”的定义是:“有关文学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的原理、原则。”教育部指定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这样表述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以哲学方法论为总的指导,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建立起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

以上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属性的表述显示出在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建构问题上的现代性诉求:第一,文学理论的知识对象是客观存在于文学现象之中的文学的本质、规律、特征,因而文学理论应当是一门由客观化知识构建起来的学科;第二,文学理论用抽象的概念、原理来阐述客观的文学现象,因而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形态应当是形式化的概念、定义、逻辑关系;第三,文学理论需要建立起一套用以阐述文学现象的原理、概念和方法,因而文学理论是一门有着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的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由此我们看到了关于构建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三种理论诉求,即客观性、形式化和学科性。

事实上,自从文学理论成为大学必修课程以来,许多作为教材编写的文学理论著作,都是以构建客观性知识、形式化理论和学科性体系为编写旨归的。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们把创建一套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2 页。

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

具有普适性诠释效应、符合客观文学事实、自成一体的理论系统当作自己职业生涯的终极境界。与此相应的是,将不符合客观性、形式化和学科性要求的中国古典文论束之高阁。就像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追随现代性一样,在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问题上的理论诉求,同样体现出一种对现代性的崇拜。

哈贝马斯认为,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们设计的现代性方案包括三大主题,即客观化的科学知识、普遍化的道德和法律、自律化的艺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用遵从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的思维方式把知识从古典神学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启蒙现代性正是以客观知识为武器展开了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解放运动。“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启蒙现代性的启蒙下举起“赛先生”的大旗,致力于引进实证化的知识体系取代以伦理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知识体系,建立客观化的知识体系成为知识现代化的主题。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当代学术议论道:“这个时代的学术主题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客观的考察。”这种现代性诉求在文学理论领域表现为以“研究文学现象的规律”为前提进行知识学的构建。现代意义的文学理论通过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即文学现象实证化来获得知识的确定性,它以文学现象为案例并由对案例的分析和归纳推导出关于文学的定义,这种方法论上对归纳逻辑的借鉴体现了知识学意义上的对客观性的追求。

知识的形式化同样也是现代性的后果。前现代性的知识是地方性和语境化的知识,因而它不具备普遍有效性。而现代性出于对知识普适性的追求,将知识从指涉物和具体语境中拔擢出来,脱除其具象事物的光晕,从而创造出一套由抽象符号和逻辑关系构建的形式化知识系统。现代性的学科知识是由术语、概念、范畴、数据、定义、公式、原理构成的,它们超越于物象和语境之上,摆脱了古典知识的那种被自然物意象纠缠的处境。鲍亨斯基写道:“近代方法论的一个最重要成果,是人们认识到在句法层次上操作语言能使思维活动大为方便。这样一种操作方法叫作‘形式化方法’。它的要点是撇开所用符号的每个意义,只考虑符号的书面形式。”“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走出古典文化中的那种依赖自然物意象和隐喻方法构建知识体系的前现代知识范式,引入西方现代性的“形式化”方法构建知识体系。与各学科知识走向“形式化”同步的是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建立。这是一种由诸如“再现与表现”、“叙事与抒情”、“形象与思维”、“教育与审美”等概念和诸如“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表达审美意识”等一般原理构成的理论话语,它与建立在直接的文学阅读经验基础上的古代诗论或文论无法兼容。这里的原因在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力图用普遍、抽象的概念、原理消除文学活动的个别情景,而古代的文论、诗论则是一种保持着个别化的文学阅读经验的地方性或语境化的知识。

现代性在知识学领域里的另一个后果是知识的学科化。启蒙现代性在社会组织的改造方面的后果是三权分立和职业分工,而它在知识领域里的后果则是古典时代那种天地人神四维一体的总体化知识解体为多种学科自立门户、自设边界、自建体制的学科化知识。现代性将社会分解为各种独立场域,这一分解过程又带来了知识的学科类型化。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高等教育体系》(1983)中称,学科分类是高等教育的“第一原理”,因为知识的专业化是“构成其他一切的基石”。知识的学科化很快进入文学学术界,比如“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界分就是知识学科化的一个极端性实例。韦勒克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就建议把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部分。文学理论作为学科出现后,其研究者就不断地为之寻

Cf. J. Habermas,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198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 页。

J. W. 鲍亨斯基:《当代思维方法》,董世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7—38 页。

B. R. Clarke,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35.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3 页。

找基础性概念,如“语言的陌生化”、“审美意识形态”等等,用以建立学科的理论内核并演绎边缘命题,形成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边界。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具有一种规训的力量,它可以把我们对文学现象的全部经验用学科性术语、准则和逻辑关系予以剪裁和定义。

从一百年前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文学研究法”课程讲授要义》到近年来编写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文学学术界经历了从古典知识向现代知识的转型,尽管西方近代理性、马克思主义等分别占据文学理论的主导性思想资源,哲学、语言学、美学分别成为文学理论的话语模式,也无论各个学派之间有多大的分歧,我们的文学理论在知识体系的诉求上却显现出一些共同点:文学理论以客观的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用概念和原理对文学现象进行普遍有效的阐释,它是一个自有其理论边界的独立学科。

二、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对象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这就意味着“文学”是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对象。但是“文学”这一概念的所指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明确,它甚至十分复杂。阿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把文本、作者、世界、读者理解为构成文学现象的几个基本内容。实际上文学活动是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文学理论的知识对象应当是文本与其他三者的关系。社会历史学派的文学理论视文本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为文学现象的主要内涵,表现论的文学理论视文本与作者心理活动的关系为文学现象的主要内涵,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视文本与作者技艺活动的关系为文学现象的主要内涵,阐释学的文学理论视文本与读者阅读活动的关系为文学现象的主要内涵。

尽管世界、作者、读者都成为了文学现象的构成要素,但文学现象的中心只能是文本。形式主义者关于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说法固然过激,可是文本是文学研究最具有“自明性”的对象,这一点无须质疑。文学活动的核心是意义的问题;作为一种生产、存储、传播和消费意义的活动,文学以文本为中心进行象征性符号实践,在话语活动中展开意义经验。无论我们怎样界定这意义在学科知识层面上的类属性——比如,审美的或无意识的、文化的或修辞的、意识形态的或认识论的,等等,都无法动摇文本在生产和消费意义的象征性符号实践中的核心地位。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对立,实际上是在争论文本是意义的生产者还是意义的存储者的问题。形式主义认为文本生产了意义,社会历史学派则认为文本只是既有意义的载体。

所以,文学理论不能停留在文本这个自明性的对象之中,它还必须达到对意义的阐释和判断。无论我们是以形式主义为理论依据主张文本先于意义,还是以社会历史学派或表现论为理论依据主张意义先于文本,都必须对意义做出阐释和判断。人们之所以要进行文学活动这种象征性符号实践,就是因为他们需要感受一种文学性的意义经验。因此可以说,对意义的阐释和判断是文学研究的终极性任务。文学理论在认识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文学时,或许将其理解为生活世界中既存的意义寻找文本形式以获得表现,或许将其理解为文本用话语形式创造了生活世界中原本没有的意义。这里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意义。文学研究的根本职责在于通过解读文本而达到对由文本表述或由文本创造的那个意义的阐释和判断。我们有时引述作者生平、历史事实等来解读文本所指涉的意义,如社会历史学派;有时在文本的边界内对话语游戏、修辞策略进行分析来寻找隐喻性的意义,如形式主义的话语分析;有时考察读者的意识活动以确定文学消费者创造的意义,如接受美学。

作为文学活动之主体的文本,其自明性、客观性和确定性无可质疑,但是作为文学理论知识对象的意义,是否也能够表述为“客观的文学现象”呢?

在现代阐释学出现之前,文学理论大都将意义看作一种“客观的文学现象”。反映论的文学理论把意义置于生活世界之中,表现论的文学理论把意义置于作者的精神之中,修辞学的文学理论把意义置于文本之中。这些理论在把意义塑造成纯粹客体的同时,也确定了自身具有阐释和判断的功效。现代阐释学的出现,标志着以认知客观真理为中心的传统认识论转向了以体验

话语意义为中心的现代认识论。在阐释学的视野里,意义是主体间性的产物,它生成于对话、问答和交流之中。而在传统知识论看来,认知活动的主体若想获得终极性的知识——真理,就必须承认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是知识的确定性的保证。文学理论研究者如果承认自己用以归纳普遍原理的文学活动案例来自于个人的阅读经验,那就意味着他的理论将遭遇合法性危机。

阐释学给文学理论的最大启发在于,意义与阅读经验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现象学方法对象征性符号实践活动的反思,就像启蒙时代实证方法在认识论中的运用一样,开创了一种新的知识学视野。阐释学使文学理论意识到,所谓客观存在的“意义”是不可能“自明性”地呈现的,一切意义都只能呈现在阅读经验当中。当文学研究者陈述关于文学文本的意义并由之构筑关于意义的诗学属性的理论定义时,他力图达致的“科学性”实则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因为他设定为意义的对象是他自己阅读经验的产物,根本不具备自明的客观性。

大多数文学理论教科书都通过对作为范例的文本进行意义解读并对这意义进行属性、功能等方面的归纳、推论,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公理,最后组合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系统。从方法论层面来看,这无可厚非。但应当辨明的是,这里充当文学理论的知识对象的意义,来自于研究者对文本的阐释,它表现为阅读经验。与其说意义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对象,还不如说阅读经验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对象。当文学理论说某伟大作品表现了时代精神历史风云社会规律、因此文学的本质就在于用形象来反映生活时,被理论家们拿来作为证据的意义,实际上是他们阅读理解活动的结果,其间充满阅读主体(即理论家)的前判断、联想、具体化、填充空白等活动的踪迹,不能被认定为实证科学的客观对象。所以斯坦利·费希称意义为“话语经验的总和”。阅读文学文本是一切文学理论活动的起点,而对文学意义的阐释、反思和定义则是文学理论活动的终点;在这二者之间,阅读经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是文学理论活动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学对象。什克洛夫斯基把文学性定义为“语言的陌生化”。实际上所谓“陌生化”是一种独特的阅读经验,它随阅读主体而变动。什克洛夫斯基读出陌生化效果的诗句,说不定在钱钟书先生眼里变成了陈词滥调。形式主义者以自己的阅读经验(“陌生化”)为超语境的普遍有效的概念,这在理论上是存在问题的。

一旦我们意识到文学理论的真正对象是阅读经验,那么,现代性赋予文学理论的那些知识学属性——客观性、形式化和学科性——就有必要接受质疑了。

三、客观性与反思性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曾提出过用存在论的真理概念替代传统认识论的真理概念(即所谓陈述与对象的符合)。海德格尔清楚地意识到,传统的真理概念把真理的言说者与真理对象切分开来,这无法解释真理的“揭示性”的性质。海德格尔似乎已敏感到实证科学潜藏的现代性隐忧。他要用“此在”在生活世界中的言说取代理性主体站在世界之外对大地的认知。海德格尔的思考在这一点上是富于启发性的:当文学理论的知识活动的主体将知识对象设想为一种与己无涉的纯客观状态时,我们就无法解释主体自身必须存在于文学活动之中的事实;没有主体在文学活动之中的存在,他以什么为依据来设置那个看似客观确定的对象呢?而在这里,阅读经验就是知识主体存在于文学活动之中的方式。比如,当诺思罗普·弗莱说文学是民族神话的“伟大代码”时,他(理论主体)和他的判断对象(文学现象)之间并不是一种“静观者”与“纯粹客体”的关系。文学文本的意义被置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链条之中,这是弗莱的阅读活动的结果,不是“客观的文学现象”。

S 费希:《读者的文学:感情的文体学》,聂振雄译,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1期。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58—277页。

从阅读经验的形成来看,作为读者的文学理论言说者与文本的对话关系是阅读经验得以产生的必要机制。正如乔治·普莱所描述的那样,文学阅读是两个意识主体之间的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阅读主体的前判断,即他全部生命经验凝结成的一种理解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参与这场对话而成为阅读经验的一种结构性力量。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把达致审美境界的阅读经验称为“视界融合”,这充分地揭示了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对象的阅读经验在生成机制上就已经脱去了所谓客观对象的性质而鲜明地体现出主观性的内涵。因此可以说,文学理论的知识活动不同于对客观事实进行认知的实证科学,它具有主体对自身的意识活动进行反思的特点。

从阅读经验的存在方式来看,读者的观念活动的场域即是阅读经验存在的场域。当我们说某文本表述了怎样的意义时,这意义并非实证科学的对象——真理——那般独立于人的观念之外客观地存在着,被表述的意义存在于阅读经验之中。文本固然是客观的,但意义不是,因为意义是对话的产物。阅读经验以心理感受的方式存在于读者的精神世界里。倘若这位读者恰好是一位文学理论的研究者,那么这存储于自我的精神天地里的阅读经验便成为他反思文学活动之本质的对象。现代性赋予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职能——构建关于文学现象的客观化、实证化的知识——是在未曾意识到阅读经验的非客观性的前提下做出的理论诉求,而当我们意识到构成文学理论之知识对象的阅读经验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在反思性(而非客观性)层面上来理解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

哈贝马斯认为,反思哲学即“主体反身以自我为客体,犹如在镜子里观看自己的形象。康德的三大《批判》就运用了这种反思哲学的方法,他把理性作为最高法官,在其面前一切提出有效性诉求的存在均须为自身辩护”。文学理论将文本与理论主体(作为学者的读者)之间的对话形成的一种主观心理经验——阅读经验——当作理论思考的对象,这也是“反身以自我为客体”的反思性知识活动。

客观性的知识要求理论以确定性事实为对象,用非个人化的话语建构普遍有效的知识体系。按此要求,文学理论不是对理论言说者自己的文学活动经验的表述,也不能以自我的观念内涵为构筑理论原则的依据。但反思性的知识活动则不同,它以理论活动主体的阅读经验为对象,这对象中积淀着主体生命经验构成的前判断,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个人性的色彩。因此,作为反思性知识的文学理论,与其说是在观察归纳文学现象的规律,还不如说是在阐述主体的意识活动内涵,如审美观念、政治观念或伦理观念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具有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性。比如上世纪晚期,中国学人们用“审美意识形态”作为基本概念来建立文学理论的知识体系,这一理论诉求的产生动机,更多地是意欲改变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美学化的文学理论体现出学者们的阅读经验中的一个重要的期待视野,即对文学的主体性或独立性的追求,形式主义文论体现了一种贵族主义观念,文化研究体现了一种民粹主义观念,神话—原型理论体现了对全球化的忧虑,等等,这说明文学理论形成于秉持着特定的期待视野的研究者对自己的阅读经验的反思活动。所以有批评家说,我批评的就是我自己。

文学理论知识活动的反思性使得文学理论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场所。反思性造成文学理论借关于文学的讨论而进行意识形态的表述,因为理论主体的阅读经验中必然地以前判断、期待视野等方式存在着意识形态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不是“静观”的知识,而是“介入”的知识。

四、形式化与语境化

卡尔·曼海姆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中评述过两种知识生产的方式。一种是“实证主义”,即

乔治·普莱:《文学批评与内在感受》,于默译,载《外国文学报道》1987年第3期。

J.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7, p. 18.

“一个从本质上被蒙蔽的学派,因为它将经验主义的某个特定概念实体化,并认为人类的知识即便没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也是完整的”,这是一种指向个别具体情境而排斥普遍有效的形式化思维的知识生产方式。另一种被曼海姆称为“形式有效性的哲学”,其特点是强调思想而贬低实在,即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曼海姆对两种知识生产方式都不甚满意。但他没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展开日益排斥着那种实证主义即紧密地依存于语境的知识生产方式,而更强调形式化方式,因为形式化思维更具普遍有效性,也就更切合总体化、普适化和全球化的现代性趋势。

只是在全球化消弭着地域文化的时代里,人们才开始对造就了总体化继而造就了全球化的形式化思维提出了质疑。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并非取消人类知识的共通性,而是强调知识生产的语境化,即不满于那种超越指涉物、纯粹形式化的知识所引发的虚无感。形式化知识就像“无物象绘画”一样,以抽象的数据、概念、逻辑关系或公理表述总体化或普遍化的知识——类似于无物象绘画要用纯粹造型表现“终极的和谐”。在现代性的鼓励下,文学理论也力图把自己塑造成这类普遍有效的形式科学。各学派的文学理论争议不断,但是都提出关于文学现象的普遍原理性质的定义,都追求对文学现象进行“终极性”判断,仿佛文学理论的研究就是寻找那最后的一个判断句——“文学是……”。这种对普遍有效的形式科学的追求,成为各派文学理论的共同点。文学性的呈现方式很难脱离文学生产和消费的语境,用形式化知识体系予以阐释和评判,其有效性令人怀疑。所以在批评实践中常出现这样的现象:一旦把某些抽象原理加之于具体作品上,文学性的光晕便荡然无存。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当我们说文学理论是对理论主体自身的阅读经验的反思时,这已经意味着文学理论并非形式化的知识活动,因为阅读经验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活动对象是无法超越语境的。对文学文本的阅读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展开,阅读的对象、阅读的主体以及阅读事件发生时的物质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个别实在,由此生成的阅读经验同样也与这具体的语境紧密地相关联。阅读是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形成的“视界融合”能否被转换成普遍有效的理论原则呢?这取决于我们怎样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由艺术感受到理论解释的“转换”的工作。如果我们采取形式化的知识生产方式,将阅读经验中的个性化表象成分去掉,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预设公理把阅读经验转换成“无经验”的定义或原理,那么阅读经验中的语境成分的丧失将使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走向纯粹形式化,我们的文学理论会变成经现代性“祛魅”之后的无历史感、无生命感的虚无主义的能指游戏。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完成由阅读经验向理论话语的转换工作:对阅读经验进行“本质联想”式的描述。在反思阅读经验的基础上,找寻阅读经验中反复出现的因素,将其放在文本与作者、读者、生活世界诸关系中确定属性和类型。这样形成的理论话语既具有普适性的效力,也能保持语境的实在性内蕴。长期以来一直困惑着我们的问题是,怎样从个别案例中构建普遍原理。当我们在语境之外取来历史理性、伦理原则、美学理念或其他学科的话语加之于个别案例并意图由此演绎出抽象的公式、定义时,常见的遭遇是,另一些案例却抵抗着那些形式化的理论通则。比如,把反映论的哲学原则加之于我们对巴尔扎克作品的阅读经验,于是有了“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之类的理论通则,但是我们对《西游记》的阅读经验肯定会抵抗这一通则。然后就有了“形象化的反映”、“能动的反映”之类的辩词来穷于应付。这种情况乃是现代性的知识规则——形式化——导致的一种尴尬状态。

知识形式化的根源还是在主体性形而上学。在现代文学理论用抽象概念和逻辑关系为阅读经验安装普遍阐释的程序时,知识的表述中已经没有了语境因素,鲜活的文学经验被删除掉了。尤其是阅读经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都消失了,只剩下同一性的形式化原理在那里规定着文

《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19 页。

海德格尔认为,主体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性造成存在被遗忘的根源,因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用预设的人类主体性对存在实行了遮蔽。

学活动的惟一属性,也不管我们读《包法利夫人》和读唐诗宋词时有着怎样不同的感受。文学理论应当是从文学活动自身中生长出来的,阅读经验的发生、呈现方式和内涵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原产地标志。从文本出发,从对文本的阅读出发,从描述自我的阅读经验出发,文学理论才能够不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所以说,文学理论应当是一种语境化的知识,而不是形式化的知识。

比如关于“意境”概念的解释,我们大都引入理性主义哲学的主客体关系原理将其理解为主观的“意”与客观的“境”之间的协调统一。这种解释使人无法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蕴涵。假如这一解释活动从对古典诗歌、古典哲学的阅读经验出发,不脱离阅读语境,则意境概念的特有灵韵更能得以体现。

五、学科性与前学科性

知识的学科化是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结果,也是现代性的“科层化”功能的结果。知识的学科化适应了当代社会分工对职业技能教育的要求。而且没有知识的学科分化,恐怕连“文学理论”这个名称都不会出现。但是,知识的学科化也给文学理论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为了建立独立学科的文学理论体系,我们总是在为它寻找一块特设的理论基石;这块基石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或者是精神分析学的,或者是结构语言学的,或者是文化人类学的,等等,但是单一的理论基石很难支撑起其意义超越于学科分类之上的文学阅读经验这座迷宫。于是就出现了自立学科门户的文学理论把文学阅读经验“单面化”的情况。

美国学者克莱恩在《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一书中用专章讨论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ity)现象。该书描述了20世纪文学学术中各种外围学科的交叉渗透、相互影响的情况。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甚至自然科学,被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引入文学学术工程之中,形成了20世纪文学研究中的一幅学科互涉的图景。

近代以来,在文学理论致力于构建自身学科边界的历史上,存在着一个悖论式的现象:一方面,文学理论极力主张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另一方面,文学理论又不断地从其他学科的知识或思想中寻求构建学科理论系统的基石。即便是雅克布森那样的形式主义者,在主张文学理论的独特研究对象——文学性——的同时,又把自己的理论置于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之上。在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阐释学等外围学科依次主宰文学理论之后,文学理论的学科身份处境变得十分尴尬。所以克莱恩在历数外围学科入主文学研究的事实的同时,她几乎没有正面澄清文学研究究竟有否仅仅属于自己的指导性理论,仿佛文学研究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互渗的试验场。而这多学科交叉是否能够孕育一个新的独立学科——文学理论——却是一个未知数。

就学科知识的有效性而言,文学研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场所。当我们用结构语言学作为学科知识基石的时候,文学的历史内涵会我们从手中溜走;当我们用文化人类学作为学科知识基石的时候,我们又面临历史决定论的危险;当我们用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作为学科知识基石的时候,文学研究有可能变成心理测试;当我们用文献学作为学科知识基石的时候,文学的诗性意蕴的消失将使文学研究枯燥乏味;当我们用美学作为学科知识基石的时候,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会遭遇遗忘;当我们用社会学作为学科知识基石的时候,文学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又无从解释……准确地说,克莱恩讨论的“学科互涉”并未在文学理论中出现,因为文学理论自身尚未成为具有独立身份的学科,它又如何与其他学科“互涉”呢?20世纪以来,文学理论像一座集贸市场,各种学科都在这里经营生意,众声喧哗,熙熙攘攘。

追寻文学理论学科身份独立性的努力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对象——阅读经验——的无学科性。从阅读经验的生成来看,文学写作者和读者各带着自己的期

参见 J. T. 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4—227 页。

待视野或前判断进行对话,从而形成了文本的话语内涵和读者的生命经验协作的产物,即阅读经验。在这场对话中,两个话语主体并没有约定依照某类别的知识规则或知识根据来展开对话;他们是在用生命经验的全部内涵进行交流。至于批评家从伦理学或政治学的角度解释文学阅读经验,这是阅读经验发生后遭遇到的学科化评判。学科化知识在我们的前判断中并不占据支配全部意识活动的地位,而前判断却是全部意识活动、甚至包括无意识活动的体现。所以阅读经验是无学科性或超学科性的。文学活动中所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意义,具有整体和综合的特性,任何对之进行“主题思想”式脱魅处理的努力都将扭曲其“文学性”的特质。现代性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企望用学科化的知识体制规训无学科或超学科的文学性,这里常常演变出文学理论和文学性之间的一种悖谬关系。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建立起了一套以美学为学科知识支点的文学理论体系,那时的人们指望美学赋予文学理论以独立性从而获得主体化的文学性。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学人却选择了具有“学科大联合”意义的文化研究来改造美学化的文学理论。其中一个重要动机,便是抵制学科化对文学性的规训。

文学活动中的意义经验不仅仅是跨学科的,更准确地说是前学科性的。诗性语言活动的特征在于用隐喻性的言语发现存在的本真意义;就诗性语言活动的言说方式而言,它是语言的生成,也是存在在语言中的澄明。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海德格尔把诗理解为真理的自我显现,这跟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是一回事,即本源的、真正的语言是意义生发的场所,因而也是诗性的言说。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一切学科知识的真正源头在文学那里,人类对大地的叩问和领会是从文学开始的。诗性的言说是意义的生发,也是语言本质的复归。文学理论不是要寻找某一外围学科知识来解释诗性言说的意义类属,而是应当去阐释诗性言说中意义生发的机制。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说文学理论的知识活动是前学科性的。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陈剑澜

关于这种悖谬关系,参见拙文《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 10 辑,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